

中正漢學研究

專輯：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Ⅲ：
跨域想像及典範遞轉

二〇一三年第二期（總第二十二期）

Chung Cheng Chinese Studies

*Feature Articles Modern Imag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II :
Boundary-Crossing Imagination and the Shifting of Paradigm*

朝鮮時代中國小說的接受及其文化意義

崔 溶 澈

・ 抽 印 本 ・

臺灣・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出版

朝鮮時代中國小說的接受及其文化意義

崔溶澈*

摘要

朝鮮一直吸收中原地區的優秀文化，隨著時代的變化，相繼接受了文言和白話小說的影響。雖然有一些衛道文人嚴守正統文學觀，極力排斥稗官小說，但不少文人仍然喜歡閱讀小說，朝廷大臣不僅私下傳閱，而且親自刊刻，因此朝鮮時代，小說的接受、閱讀、創作和刊刻的主體，最初是上層文人，後來慢慢擴大到中下層文人以及婦女階層。在朝鮮，無論是傳入的中國小說還是本國作者創作的漢文小說，皆自上而下擴大發展，只有民間產生的說唱體小說是一個例外。

對中國小說持有寬容態度的朝鮮文人，也有機會參加燕行使節團，深深體驗中國文化，直接接觸小說等通俗文學的世界。雖然在文集留下的明確記載不多，但目前的資料還是可以推斷他們利用赴燕機會，閱讀並購買小說作品而將之帶回。先是在較小的範圍內輪流閱覽，遇有機會則加以出版，使之更為廣泛流傳，後來出現了對其加以翻譯，做出諺解本以便宮廷妃嬪宮女或貴族家庭的婦女閱讀欣賞。

到了朝鮮後期，明末清初的小品文和稗官小說的文體直接影響到朝廷文人的寫作習慣，以至於部分高層官吏非常擔心這種現象會導致文風浮華輕薄，因強烈要求國王推動「文體反正」運動，禁止輸入中國文集和稗官小說等書。但是，由於此時小說的影響不只限於朝廷，更漫延於社會其他階層，國王只能禁止朝臣文風浮華，卻無法遏止社會上廣為流佈的自由文風，小說仍然影響甚大。朝鮮晚期更出現大量的翻譯文學，表現出近代民族意識的逐漸提高。同時，小說這種文體也逐漸占據了文學的主導地位，以迎接近代開化期的到來。

關鍵詞：中國小說、朝鮮刊本、剪燈新話、三國演義、文體反正

* 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長。

一、朝鮮文人接受中國小說的意義

朝鮮王朝建立之後，儒家思想和典章制度面學習明朝。因此，朝鮮社會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文化系統、不同的文字系統共存的局面。朝鮮的民族和語言系統，雖然不同於中原，而文化和文字（漢字）卻屬於中原系統，並自認為是最高文化民族。因此，當中原地區被北方少數民族佔據時，朝鮮民族認為文化中心移至東方，驕傲地自稱為「小中華」，¹認為當大中華文化衰弱之時，其中心轉入朝鮮半島並可繼續發展。

朝鮮文人的文學觀，幾乎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學觀相同。但在朝鮮初期，文人對小說並無嚴格的排斥態度。²世宗年間集賢殿學士受命編纂《龍飛御天歌》，利用《剪燈餘話》的一節故事來加註，即可說明這一點。³《太平廣記》在朝鮮早期流傳最廣，曾出現了朝鮮選錄本（成任《太平廣記詳節》），朝鮮模仿本（成任《太平通載》，慎後聘《太平遺記》等），朝鮮翻譯本（《太平廣記諺解》）等。朝鮮初期，最有文名的徐居正（1420-1488）為成任的《太平廣記詳節》寫序文，文中坦白地說，雖然他曾認為稗官小說非關世教，不是很看得起，但在與成侃（成任之弟，字和仲）討論後，對成侃的觀點加以認同。文中引用成侃的話，如下：

和仲笑曰：「子誠確論也。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儒有博學而不窮，能博而能約之，庸何傷乎？況張而（不）弛，文武不為，必皆聖賢而後讀之，聘（聘）氣有所未周，安能上下古今，出入貫穿，為天下之通儒乎？何子之示狹也？」。⁴

後來成侃過世，其長兄成任帶來此書，徐居正便感慨為序。而徐居正本人的《太平閑話滑稽傳》更是朝鮮前期代表性的說話（故事）集。成任、成侃、成俔三兄弟出身於著名文士家庭，皆為當代文豪，成侃嘗在集賢殿讀《太平廣記》，成任也在集賢殿編纂

¹ 「中華」之稱，始於高麗時期，是宋人面對遼金的威脅而考慮到外交現實，贈予高麗的稱呼。到了朝鮮王朝，才成為總體性的文化意識。

² 這裡所謂「小說」，指的比較廣義的範圍，包括文言和白話、短篇和長篇的小說。因此，這裡既包括《太平廣記》、《剪燈新話》等短篇文言小說集，還包括《三國演義》、《紅樓夢》等長篇小說，有時甚至談到稗官雜記，漢文笑話集《鍾離葫蘆》也是討論的對象。

³ 《龍飛御天歌》鄭麟趾外，註釋引用《剪燈餘話》卷二〈青城舞劍錄〉有關宋太祖登基一段。此書正文和漢詩成立於1445年，對歷史典故加註的是1447年。由此可知，這時《剪燈餘話》已經流傳到朝鮮，而當時此書和《剪燈新話》是合刊出版，這兩部作品都在朝鮮文人社會流通的。

⁴ 徐居正〈詳節太平廣記序〉（1462年），《四佳集》卷4，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11（景仁文化社，1997），頁237。《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I》（首爾：太學社，2001），頁83。

《太平廣記詳節》與《太平通載》，成俔則留下稗說雜記《慵齋叢話》，上述諸人是其所處時代擁有最高地位的儒家文人，但對稗官小說並無嚴格排斥的立場。

對於稗官小說，當時文人都知道一句由來已久、在頭腦中已根深蒂固的言論，即「子不語怪力亂神」。大部分有關小說的討論，均自此句始。如成任要李承召寫序時，曾記錄了他們之間的對話：

侯（成任）曰：「怪力亂神，夫子所不語，後之人將指二議之曰：『此所謂非聖之書，則乃何？』」予（李承召）應之曰：「易著龍圖，書載龜文，詩歌玄鳥武敏，記禮者，言四靈之應，作史者，書六鷁之飛，聖人修經，皆存而不削，豈無謂歟？誠以天下之理無窮，而事物之變，亦與之無窮，未可以執一論也。其『不語』者，恐人不明乎六經，而惑於索隱行怪之說耳。若能先明六經之道學，而造乎正大高明之域，則雖街談巷說鄙俚之甚者，皆理之所寓，必有起予之益。況於岑寂伊鬱之際，得此而觀之，則如與古人談笑戲虐於一榻之上，無聊不平之氣，將渙然冰釋，而足以疏蕩胸懷矣，斯豈非一張一弛之道乎？不然則稗官之職，將不設於古，而小說之家，亦不傳於後世矣。」侯曰：「然！」因書而歸之。⁵

李承召（1422-1484）也是著名文人，他的小說觀，是這一時期的代表觀點。當時喜讀小說的文人，實際上多數為高級官員，很多擁有燕行（朝天）的經歷，如李承召於1459年以副使身份行燕，徐居正於1460年以隨員身份赴使，成俔於1481年為隨員燕行，1485年則以千秋使的正使身份赴燕。他們對中國的感受各有不同，這些都影響到他們對中國文學的理解和觀點。

在朝鮮文人的立場來看，稗官小說雖然是儒家所忌諱的雜書，但是尚有助於耳目之博覽、一張一弛及消遣養病之功能。朝鮮初期方外文人金時習（1435-1493），⁶對小說持有比較明確的態度，其獨特觀點可見於他的〈題剪燈新話後〉長詩和〈題金鰲新話〉二首詩中。在對《剪燈新話》整體內容作評價時，他寫道：「山陽君子弄機杼，手剪燈火錄奇語。有文有騷有記事，遊戲滑稽有倫序」，之後則對小說本身之意味加以品評：

⁵ 李承召〈略太平廣記序〉，《三灘集》卷10，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11，同註4，頁475-476。母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I》，同註4，頁87。

⁶ 方外文人，原指經高麗末朝鮮初的社會混亂中，不參與現實政治、不願出仕而自由活動的反抗文人。一般傾向於道佛思想，具有放達部羈的特色。朝鮮時期，文人的類型，還有官僚型文人和士林型文人。前者參與國政，積極關心現實問題，後者歸隱鄉里，讀書教書，崇尚道德，實踐躬行儒家理想的學者型文人。金時習是朝鮮初期方外文人的代表人物。

「初若無憑後有味，佳境恰似甘蔗茹」，這是說慢慢閱讀欣賞虛構之小說時，會對個中真味有更深體會。他並引用經典中的虛構奇事，如《易經》的「龍戰」和「鬼車」，《詩經》的「雉雉」等，說明「夫子不刪良有以，語關世教怪不妨」。金時習對小說的文體特徵很有理解，對小說持有肯定的態度，因此他自己也從事創作，寫出了朝鮮第一部傳奇小說集《金鰲新話》。他在書後留下兩首詩，其中有言曰：「挑燈永夜焚香坐，閑著人間不見書」，⁷描繪了自己在梅窗月夜創作小說的情景，同時他非常驕傲地聲稱自己所做之書並非普通常見的雜書。

據說金時習在慶州金鰲山創作《金鰲新話》之後，藏於石室，⁸也許有抄本流傳，到了明宗年間，尹春年盡力搜集遺稿，終於以木版刊行《金鰲新話》。朝鮮中期湖南儒學領袖金麟厚在閱讀《金鰲新話》後，題詩曰：

金鰲居士傳新話，白月寒梅宛在玄。暫借河西揩病目，頭風從此快痊之。⁹

金麟厚閱讀的《金鰲新話》可能就是尹春年刻本，此書應出現於 1560 年之。

10

總之，朝鮮早期文人對小說的刊行，持有比較寬容的態度，當時只有文言小說流入，還沒出現大量的白話小說。《太平廣記》和《剪燈新話》是在朝鮮前期流傳的中國小說中比較重要的。

⁷ 崔溶澈《金鰲新話的版本》〈金鰲新話朝鮮木版本全文（影印）〉（首爾：國學資料院，2003），頁 108。此詩又收錄《梅月堂集》卷 6，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13，同註 4，頁 194。詩題「題金鰲新話二首」。母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 I》，同註 4，頁 246。

⁸ 金安老（1481-1537）《龍泉談寂記》，「入金鰲山」，著書藏石室，曰『後世必有知岑者』。其書大抵述異寓意，效《剪燈新話》等作也」。母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 I》，同註 4，頁 177。

⁹ 金麟厚（1510-1560），號河西，湖南地方性理學大家，與嶺南地方的李滉的地位相比。《河西集》卷 7。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33，同註 4，頁 134-135。詩題「借金鰲新話於尹禮元」，題下註曰：《新話》即梅月堂金時習所撰。母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 I》，同註 4，頁 246。

¹⁰ 筆者於中國大連發現的《金鰲新話》，即尹春年編輯出版。此書出來不久，在壬辰倭亂時期（1592-1597），流傳日本，藏在養安院，到了明治（1868）以後被流散，經大谷光瑞收藏於大連圖書館。影印本收錄於《金鰲新話的版本》（國學資料院，2003 年）。

二、朝鮮文人刊刻中國小說的心態

朝鮮時期的文人社會非常重視儒家經典，爲了參加科舉考試，書生必須閱讀中國傳統的經書和史書，後來慢慢包含了朝鮮名儒著作和東國歷史。至於稗官小說，正統文人一直認爲此類小書壞人心術、無濟於事，因此強烈反對閱讀。表面言論雖然如此，但是當一般文人有空閑之時，他們還是經常欣賞中國的文言小說，這也是當時文人的特權。因爲他們是理解漢文、有能力作文作詩的人，不同於一般老百姓。在他們的眼裏，中國文言小說，即便屬於「怪力亂神」的不經之文，但仍可以從中理解中國的歷史和社會、人情和風物，在消閑之時，開闊眼界。

在朝鮮刊行中國小說的人，主要是朝廷的高級文人，這是朝鮮獨特的現象，不見於中國明清時代或日本的江戸時期。朝鮮初期文人對中國小說的接觸，主要是從《太平廣記》和《剪燈新話》開始的。《太平廣記》爲宋太宗敕命朝廷大臣李昉主編，978 年成書，981 年刊行，是一部古代野史小說總集，中國說部的寶庫，包括六朝志怪、唐傳奇等無數作品。但是此書出現之後，宋朝文人對之並無特別關心，流傳不廣，影響不大，直到明嘉靖 45 年（1566）談愷刊本出現之後，才引起人們注意。但是，此書早在高麗王朝時期便已流入，著名文人朴寅亮（？-1096）很熟悉此書，他以高麗使節身份去南宋時，和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交流，朴寅亮詩中有「花面艷吹，愧鄰婦青唇之斂」之句，有司彈劾，神宗下問時，趙元老初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三催問，才奏此句來自《太平廣記》故事。¹¹此外，有高麗文人黃文通曾寫過《太平廣記撮要詩》（1146）一百首，高麗時期的《翰林別曲》中也有「太平廣記四百卷，其景幾何如」之句。

由此可見，高麗時期流傳的《太平廣記》是從北宋傳來的，此書一直到朝鮮初期還很流行。在朝廷文人的眼目中，與其說此書是稗官小說的總集，毋寧說是中國皇帝敕命而編的古典說部，因此不少人給予此書以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認爲該書是不應接觸的稗官雜記。前述成侃在集賢殿愛讀此書，成任編纂《詳節本》，及徐居正爲此書寫序，都是出於此種心態。

在朝鮮朝廷官署中，校書館（別稱芸閣或芸館）擔任國家及朝廷所需經籍的印刷出版及頒布的職能，並管理朝廷所需香祝和印篆等。雖說小說的刊行決不會是國家大事，

¹¹ 此事收錄於宋朝文人王闢之的《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9〈雜錄〉「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鄰婦青唇之斂……』之語……神宗再諭之，（趙）元老誦《太平廣記》云，……元老之強記如此，雖怪僻小說，無不該覽。」《文淵閣四庫全書》1036。

但是朝鮮時代還是有文言小說在校書館出版，同時，在中央機構不易出版之時，也有地方官員出版小說。從下面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

朝鮮明宗年間的文化領袖尹春年曾擔任校書館提調，從個人興趣出發，在其任期或非任期，皆利用種種方法，出版多種小說和詩話等書籍。在他影響之下出版的有林芑集釋的《剪燈新話句解》和金時習所著的《金鰲新話》，近年發現的金屬活字版《三國志通俗演義》，筆者認為也可能是他的周旋之下，由校書館出版的。尹春年的思想是開放的，不太拘泥於正統儒家的保守文學觀，因此他利用手中的文化權力，在小說和詩話的編輯出版方面，敢作敢為。在對金時習成就進行評價時，也將金時習的佛教著作和小說《金鰲新話》包括進去。這與稍後掌握思想界和文化界之牛耳的李滉（退溪）的態度，全然不同。李退溪是理學大家，自然不會容納佛道思想和稗官小說，因此他為金時習寫傳記的時候，對有關佛教著作和小說作品隻字不提。朝鮮後期《金鰲新話》渺渺無聞，可能與這些儒家文人的消極文學觀有關。不過難能可貴的是，當時也有由於仁宗夭折，失望而歸鄉隱居的湖南儒學大家金麟厚閱讀欣賞《金鰲新話》的紀錄。朝廷最高出版機關校書館出版小說，在尹春年之前，還有幾個例子。如宋世琳曾編纂笑話集《禦眠楯》，當時其弟宋世珩恰任校書館提調，為了長期保存其兄的著述，私下委託校書館部下著作金鎔將之刊刻出版。他自己在序文中也坦白地說：「假公行私之責，終難追矣。功訖披閱，不覺次泚（泚此）顙。壺山君宋世珩謹識。」¹²

宋世珩任校書館提調之時，尹春年從清州牧使李楨處獲得中國元代楊載所編的《詩法源流》，因想和其他學者共同閱讀，遂請宋世珩印行此書。這說明當時有力人士通過互相請託在校書館刻印了各種文學書籍。¹³

校書館提調申光漢（1484-1556）曾創作一部傳奇小說集《企齋記異》，校書館門下二官員著作趙完璧和別提¹⁴申濩因互相商議，在共同努力之下，私下出版了《企齋記異》。申濩在跋文中透露：

余難之曰：「君是舉甚善，竊念相公方領敝館，不知者，謂出於相公之意，則得無近於嫌乎？」曰：「弗（口弗），相公功名事業，冠冕廟堂，道德文章，衣被儒林。今此編，視平生著述，不啻若泰山一毫，奚足為相公輕重焉，而樂

¹² 宋世珩〈禦眠楯序〉，東國大學校：《韓國文獻說話全集》（首爾：太學社，1981）7，頁124-125。毋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Ⅰ》，同註4，頁109。

¹³ 尹春年《詩法源流》〈詩法源流跋文〉，「其後幸得他本於李牧使楨，思欲與學者共之，白於校書館提調宋世珩而印之，廣布於世。」收錄於安大會：《尹春年與詩話文話》（首爾：召命出版，2001）頁614。

¹⁴ 著作和別提，都是官名，「著作」為校書館正八品官職名，「別提」為校書館正、從六品官職名。

與人公共者，吾素志也。伏而不出，吾不忍也。古詩云『一代不數人』，吾何暇別嫌焉。」余曰：「子之言，得矣。」仍略序其語為跋。¹⁵

由此可見，當時校書館官員在決定出版包括小說在內的文學書籍時，比較隨意。申濩的序文中雖然說，《企齋記異》出版的事項是他和同門趙完璧主動商量決定的，但在身為提調，亦即國家出版局長官的申光漢不好意思要求將自己創作的小說出版的情況下，他的門下書生兼本官署的官員主動出版，也是遂其所願。

校書館官員隨意出版稗官小說之事，被後人批評。尹春年在政治失意後不久去世，宣祖即位初年（1568），奇大升就強烈批判校書館私下出版《剪燈新話》等小說之舉。認為小說故事為不經之說，輕薄文人竟敢在校書館刻印，遂致閭巷之間，爭相出版，風俗因之敗壞。批評矛頭直指尹春年等人。他還提到，國王（宣祖）曾引用過《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張飛一聲走萬軍」一句，強調此語不見於正史典籍，而通俗小說的內容是不可靠的，朝廷大臣不應該閱讀此類稗說，因希望國王禁止毀滅《剪燈新話》和《三國志演義》等書。¹⁶

奇大升批評小說弊端之後，不少文人強調朱熹的正統文學觀，繼續對小說雜書加以非難，李退溪的金時習評傳中，僅強調儒家思想，漠視佛教和小說著作正是此種文學觀的表現。

但是，奇大升對《三國志演義》「此書出來未久」之語引起了東亞學界的長期爭論，中心在於奇大升之語是否意味著當年已經出現了朝鮮刻本《三國志演義》。這一爭論隨著年前（2010）奇大升所說的印本（殘本）的發現而塵埃落地，該印本全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現存「卷之八上」部分和「卷之八下」部分（前後殘缺）。據學界考察，這是 1560 年左右校書館利用丙子字（1516）印刷的本子。由於出版小說時，使用金屬活字印刷的例子，比較罕見，遂使此書受到格外重視。¹⁷

筆者認為，在當時實際掌握文化權力的領袖之中，能促成此書刊刻的，非尹春年莫屬。尹春年曾赴燕京，有機會購得書籍，此中便可能包括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回國後，在其努力之下，校書館以銅活字出版，是很有可能。《剪燈新話句解》和《金鰲新話》皆是在他的努力之下出版問世，因而，他也完全可能為提供同好共同欣賞，而主持了《三國志演義》的刊刻。

¹⁵ 《企齋記異》收藏於高麗大學晚松文庫，蘇在英《企齋記異研究》，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所，1990。原本影印和翻譯，有朴憲淳的《企齋記異》（首爾：凡友出版，2008），影印頁 99-100。

¹⁶ 奇大升向國王談論小說的一段，出現於《宣祖實錄》（宣祖 2 年，1569.6.20.）

¹⁷ 影印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朴在淵·金瑛校注，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首爾：學古房出版，2010。

地方官署出版小說的例子也不少。例如慶尚道崑陽（今泗川）郡守尹景喜曾出版《花影集》，請崔岵寫跋。崔岵在文中透露，此書由尹景喜的從祖父尹溪赴燕京時（嘉靖丙午 1546）購得。¹⁸文言小說集《效顰集》可能也是經由這樣的過程在朝鮮出版的。《效顰集》的部分故事，早被收錄在成任的《太平通載》中，後來國王燕山君要求赴燕購買（1505）。此書在朝鮮的出版，應是在此之後。該朝鮮刻本《效顰集》，目前收藏於日本蓬左文庫，可惜沒有朝鮮文人的序跋文，無法弄清其出版過程。

也有圖書是經由尹春年努力在地方官署出版的，如果漢城校書館要出版的朝廷所需之書或私下請托之書已經排滿，他就利用素來熟悉的地方官員將圖書付刻。例如，在《文斷》序文中，尹春年自己透露：

其年秋，光仲（姜昱）出守帶方（南原），余（尹春年）語之曰：『帶方力富，可刊一書，以惠後學。』光仲曰：『願得可刊之書』。余曰：『論學文之法，莫詳於《文筌》、《文斷》，而《文筌》則已刊於光州矣，請以《文斷》為贈』。光仲曰：『諾』。今年夏，光仲既刊於梓，遂請序於余。¹⁹

上引文字記錄了尹春年請託地方官推動新書印行流傳之事，《文筌》在光州刊印，《文斷》在南原刊印。此外，《詩家一指》也是由尹春年請託全羅監事南宮淑在全州刊行的。當時（1550）尹春年以災傷御史的身份視察湖南，這一身份使地方官員對其請托不敢拒絕。尹春年對刊行文學書籍的熱衷，促進了朝鮮的小說出版事業。

此外，1622 年在平壤（箕城）由笑山子刊行、選自明末笑話集《絕纓三笑》的《鍾離葫蘆》，近年（2001 年）由筆者發現。²⁰該書前後落頁，但其跋文卻收錄於金佺（1597-1638）的《海東文獻總錄》中，由此可考察此書的來源和出版情況。在這個時期的文人中，接受和出版中國小說的多半是曾赴燕的燕行使節，如尹溪（1546 年燕行），柳夢寅（1592、1609 年燕行），許筠（1597、1609、16151、616 年燕行），李睟光（1611 年燕行）等。柳夢寅在《於野談》中說，「今年春新刊中原書七十小說，目曰『鍾離葫蘆』，自西伯所來」，²¹所謂西伯（關西伯）就是平壤監司，當時的平壤監司

¹⁸ 《花影集》目前收藏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現有影印本，《花影集》（兼收〈劉方三義傳〉諺解文），鮮文大學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1999 年。

¹⁹ 尹春年〈文斷序〉，《文斷》，收錄於安大會：《尹春年與詩話文話》，同註 13，頁 300-301。

²⁰ 參看崔溶澈《鍾離葫蘆》（原文影印及翻譯），鮮文大學校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2002。崔溶澈〈朝鮮刊本中國笑話鍾離葫蘆的發掘〉，《中國小說論叢》第 16 輯（2002）頁 267-306。崔溶澈〈明代笑話絕纓三笑和朝鮮刊本鍾離葫蘆〉，《中語中文學》第 36 輯（2005）頁 245-285。

²¹ 柳夢寅《於野譚》卷三，東國大學校：《韓國文獻說話全集》6，同註 12，頁 235-236。毋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 I》，同註 4，頁 204。

是柳夢寅的好友朴燁。柳夢寅非常喜歡野談和笑話，自己所編《於於野談》便可為證。我們可據柳夢寅前述之語推測《絕纓三笑》可能是由柳夢寅購得於燕京，而選輯於《絕纓三笑》的《鍾離葫蘆》，可能是由朴燁刊刻的。

許筠也曾於燕京購得中國書籍四千餘卷，²²並在燕京讀過唐傳奇〈無雙傳〉，²³當時他購買的書籍當中，應有不少明末文人文集和小說作品。他在〈西遊錄跋文〉中說：

余得戲家說數十種，除《三國》、《隋唐》外，而《兩漢》語，《齊魏》拙，《五代殘唐》率，《北宋》略，《水滸》則姦騙機巧，皆不足訓，……有《西遊記》云出於宗藩，即玄奘《取經記》而衍之者。²⁴

可見他看到的那些明代小說，可能都是他自己購得的。正是在這些作品的影響下，許筠創作了韓國文學史上的不朽作品《洪吉童傳》。

朝鮮時代出版的中國小說，集中於文言短篇小說集，幾乎沒有白話小說，而只有長篇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是唯一的例外。這些小說的出版目的是多方面的，文人讀者在欣賞作品之時，可以從中了解當時中國（明朝）的社會、人物、風俗、語言等。也有一些年輕文士，以文言小說作為學習漢文的一些規範（也是明朝的文體）。因為如此，後來引起文體反正的風波。朝鮮出版中國小說的時間，主要集中於朝鮮前期和中期，到了後期，出現了大量的翻譯小說（大部分為抄本），還出版了著名的韓國漢文小說和韓文小說。因此，相對來說，中國文言小說的出版，便不像之前那樣需要了。只有《剪燈新話》還在全國各地繼續出版，廣泛流傳。

三、衛道文人對明清小品及稗說的批評

明末小品文在十八世紀的朝鮮社會流行，最早可能開端於十六世紀初的許筠。當年的天才文人許筠曾在赴燕之機，接觸了李卓吾的《焚書》和袁宏道文集，²⁵他曾引錄過

²² 許筠《惺所覆瓿藁》〈閒情錄凡例〉（1617年）「甲寅乙卯兩年，因事再赴帝都，斥家貲，購得書籍幾四千餘卷。」《國譯惺所覆瓿藁》4，影印頁2，1967。母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 I》，同註4，頁199。

²³ 許筠《乙丙朝天錄》中有〈讀無雙傳有感〉一詩。崔康賢《國譯乙丙朝天錄》（首爾：國立中央圖書館，2005）頁49-50。

²⁴ 許筠《惺所覆瓿藁》卷13〈西遊錄跋〉，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74，同註4，頁249。母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 I》，同註4，頁122。

²⁵ 許筠《乙丙朝天錄》中有〈讀李氏焚書〉和〈題袁中郎酒評後〉詩。崔康賢《國譯乙丙朝天錄》

袁宏道《觴政》中的一段句子，在其〈閑情錄〉中，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為逸典，不熟此傳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之語。當時，許筠是超越時代的先進文人，帶著革命精神，對明末的文藝復興潮流有深刻認識，只可惜他因謀叛嫌疑突然被處死刑，無法實現他所夢想的新世界，只留下小說《洪吉童傳》作為自己的代辯之言。

此後二百年來，明末清初文人的具有個性的文風，已經漫延於朝鮮朝廷文人的寫作之中。朴趾源（1737-1805）參加燕行使節團去北京熱河之時（正祖 5 年,1780），是清高宗乾隆皇帝七十壽慶進賀使的隨行人員。在燕行過程中，他的好奇心與博學強記的文學天才相作用，使他留下了著名的燕行遊記《熱河日記》。清朝在滿洲興起之後，曾兩次侵略朝鮮（丁卯胡亂 1627，丙子胡亂 1636），雖然朝鮮朝廷不得不朝貢清皇室，而民間的文人學士卻一直看不起滿清政府，認為這個野蠻民族的文化程度比不上「小中華」朝鮮，仍然保持崇明反清的態度。但到了十八世紀，英祖、正祖年間的一些開放文人在親身遊歷了乾隆時期的北京，看到當時世界第一流的文化之後，受到衝擊而極為感慨，遂開始提倡學習北京文化，同時要了解西方的科學文明。持這種主張之人被稱為「北學派」，朴趾源就是他們的代表。北學派在當時的文人社會中，影響甚大，無論思想或文風都以北學派為典範。朴趾源《熱河日記》的文體，比較開放自由，沒有受到古文的約束，文中甚至加入不少白話和通俗諺語，他創作的幾篇小說，帶有強烈的諷刺和寓言意味，毫無顧忌，大膽進行虛構假設。

在英祖年間，國王和大臣們對稗官小說持有比較開放的態度。英祖大王親自寫過〈題文苑植橘〉一詩。《文苑植橘》是前朝文臣（右議政）金錫胄編輯的中國文言小說集，²⁶收錄唐宋明傳奇小說二十篇。英祖大王晚年也喜歡聽小說故事，消愁解悶。英祖的繼承人思悼世子（莊獻世子），雖受到父親欲使其成為完美理想君主的極大壓力，但仍具不受拘束的個性，最近發現，《中國小說繪模本》的完山李氏序文和小序，應為思悼世子所寫。²⁷據序文所言，完山李氏命宮廷畫員金德成繪模中國小說版本上的許多插圖並編輯成冊。如果完山李氏果然是思悼世子，他應該非常喜歡中國小說，而且宮廷所藏的作品也有很多。序文中提到的小說目錄蔚為大觀。這是乾隆中期以前出現的相當多

（首爾：國立中央圖書館，2005）頁 43-44。

²⁶ 至於《刪補文苑植橘》的編者，英祖大王在〈題文苑植橘〉一詩中只說到金相（「抄文其若果植橘，憶昔金相類聚悉」），2010 年金榮鎮從《海東書冊》中找到金錫胄（1634-1684）為其所編者的證據。參看金榮鎮〈關於朝鮮後期書籍出版與流通的考察〉，東洋漢文學會，《東洋漢文學研究》第 30 輯（2010.2），頁 5-28。

²⁷ 《中國小說繪模本》序文作者完山李氏的身份一直在學界爭論，2009 年鄭炳說從完山李氏序文和思悼世子遺稿文集《凌虛閣漫稿》中的文章的内容極為相似的事實，考證為思悼世子就主編《中國小說繪模本》的完山李氏。參看鄭炳說〈由思悼世子之命所編的畫帖：中國小說繪模本〉，《文獻與解釋》第 47 輯（2009.4），頁 126-135。

的中國小說作品流傳到朝鮮的證據。²⁸與此同時，尹德熙所記錄的〈小說經覽者〉中出現的作品竟達到 128 種之多，²⁹其中包括比較罕見的《鳳凰池》、《杏花天》、《快士傳》、《夢月樓》、《濃情快事》、《賽花鈴》、《王翠翹傳》、³⁰《玉樓春》、《定情人》、《春柳鶯》、《歸蓮夢》、《留人眼》、《五鳳吟》、《畫圖緣》、《戀情人》等清初小說。

到了正祖初年，文士風氣大大變化。正祖在其祖父英祖希望將他培養成模範君主的期待下成長，本人在少時也親眼目睹其父被關在米櫃餓死的悲慘情景，對輕浮孟浪很排斥。在即位之後，他下決心要改革浮華的文壇風氣，開始批評朴趾源的《熱河日記》。在《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實錄》中出現不少有關稗官小說的言論，幾乎全部是嚴加批評，認為小說壞人心術，禁止燕行使節購買小說，甚至連經史書也不准帶回國，在發覺朝廷大臣閱讀小說之時，嚴加指責。從《正祖實錄》中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正祖大王的強烈意志。

教曰：……所謂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雜說，尤有害於世道。關於近來文體，浮輕噍殺，無館閣大手筆者，皆由於雜冊之多出來。（正祖11年，1787.10.10.）

批曰：……予嘗語筵臣曰：欲禁西洋之學，先從稗官雜記，禁之。欲禁稗官雜記，先從明末清初文集禁之。（正祖15年，1791.10.24.）

上曰：……大體明清之文，噍殺奇詭，實非治世之文。《袁中郎集》為其最矣。近來俗習，皆未免捨經學而趨雜書，世無有識之士，愚民無以觀感。予於小說，一不披覽，內藏雜書，皆已去之，此可知予苦心矣。（正祖15年，1791.11.7.）

召見冬至正使……曰：……如欲拔本而塞源，則莫如雜書之初不購來。前此使

²⁸ 完山李氏序，金德成外畫《中國小說繪模本》，江原大學出版部。書中收錄 128 幅插圖（《西游記》、《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插圖，共 78 幅，佔三分之二。其他，還有《文苑楂橘》、《型世言》等比較罕見的作品），序文中所提到的，80 多種書目中，小說有 74 種。（歷史小說之外，還有淫詞小說 16 種，才子佳人 12 種等，反映清初所流行的文學潮流）

²⁹ 尹德熙（1685-1766）為著名畫家尹斗緒的兒子，也是著名文人畫家。他搜集中國的各種畫冊時，購得小說作品，或得知其目錄（可能要參考小說插圖），在文集中記錄下來。朴在淵〈關於尹德熙的小說經覽者〉，《文獻與解釋》第 19 號（2002.5），頁 207-216。

³⁰ 《王翠翹傳》，即青心才人的《金雲翹傳》，20 回。這是嘉靖年間金重和王翠翹、王雲翹姊妹婚姻的故事。原來有余懷《王翠翹傳》（收於《虞初新志》卷八）等。

行，固已屢飭，而今行則溢加嚴飭。稗官小記姑無論，雖經書、史記，凡係唐板者，切勿持來。……經史則異於雜書，如是嚴禁，雖似過矣，而我國所存，咸備無闕，誦此讀此，何事不稽，何文不為？況我國書冊，紙韌而可以久閱，字大而便於常目，何必遠求薄小纖細之唐板乎？此不過便於臥看，必取於此，而所謂臥看，亦豈尊聖言之義乎？（正祖16年，1792.10.19.）

上曰：……予自來不喜看雜書，如所謂《三國志》等書，亦未嘗一番寓目。燕閑之所嘗從事者，不外於聖經賢傳。（正祖23年，1799.5.5.）³¹

正祖大王即位之後，下令乾淨收拾的那些宮廷收藏的雜書應該是思悼世子閱覽過的那些明清小說，尤其是附帶插圖的小說版本。當年宮廷收藏的版本應是善本，或比較好的版本，不少可能還是初刊本，現在看來是很寶貴的，可惜都沒有了。尹德熙所見到小說目錄，比較全面，收錄的非常廣泛，但是也未能完整流傳下來。當時出現的那些翻譯小說，目前也找不到原書的底本了。

李相璜與金祖淳在藝文閣（翰苑）值班時，曾在晚上閱讀《唐宋百家小說》和《平山冷燕》，被國王正祖發覺，受到責備。³²李相璜（1763-1841）被國王譴責之後，寫了〈詰稗〉一文及自戒詩三十首。〈詰稗〉設定兩個人物（一是辯護稗說的，另一是詰難稗說的），以對話的方式論辯稗官小說的好處和壞處。此二人的對話是李相璜心理變化前後的表現。他寫〈詰稗〉是要極力表現自己已經改過遷善，帶著強烈的說服力來論證稗說是壞人心術的東西，希望以此得到正祖大王的認同。但是，如今我們再看〈詰稗〉，反而會從中發現當年喜歡閱讀小說的朝鮮文人的有力論辯，更可以理解他們的想法。詰者主張不應該閱讀欣賞小說，但論辯之語空泛，只是搬來古文運動的一些主張而已。我們可以看一看非難者和辯護者的兩種不同觀點：

稗者曰：文章之不古，若世級然也。力又能倒挽斯世，歷秦漢而上之，列之於商周虞夏之間者乎？否則不可挽而上。固也，今之文之不能為宋為唐，亦猶宋唐之不能為周為商也。代各有一代之體，不相逾越，袁石公之言，是也。

³¹ 以上原文，均來自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所提供的《朝鮮王朝實錄》（The Annals of the Joseon Dynasty）網站中的原文部分。網址：<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jsp>

³² 《正祖實錄》卷 36，正祖 16 年（1792）10 月 24 日，「先是丁未年（1787）間，相璜與金祖淳伴直翰苑，取唐、宋百家小說及《平山冷燕》等書以遺閑，上偶使入侍注書，視相璜所事，相璜方閱是書，命取入焚之，戒兩人專力經傳勿看雜書。相璜等自是不敢復看稗官小說。」網站 sillok.history.go.kr

詰曰：果如中郎者之言，八代之衰，獨不有韓文公者，出而振起文風乎？獨不有歐陽子者，乘五季之弊，黜去險怪，蔚然為近之韓愈乎？然則烏在乎文章之不能挽而上也。³³

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爭論也是唐宋古文運動派和明末公安派之爭的表現。稗者一直主張吸取小說的好處，引用孔子「不有博弈者乎，猶賢乎已」之句，並認為「讀稗官，將以多識廣聞也」，「稗官出而文章之妙，盡矣」等。詰者則以種種方式對策，最後甚至極端地說：「噫，其不可知矣！是將欲望為無父無君焉已乎？」如此使「稗者遂無以應」。李相璜還寫了三十首詩，附於此文之後。

為建設儒家理想國家而日夜憂心的正祖大王，自然要否定浮華輕薄的文風，而強調純正文體的復興，以重現唐宋古文運動的輝煌，建設真正發揮朱子學理想的儒家社會。一些衛道文人以同樣的想法，極力排斥明清文集或小說的影響。但可以推測，在李相璜等人那裏，更接近時代的明清文學，更接近老百姓的通俗文學，更接近情感的人情文學，是更具吸引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時代潮流，不可迴避的文學本身的發展趨勢。近代意識的變化，從此來到人們的面前。

四、朝鮮晚期大量出現的諺解翻譯本

由於語言系統互相不同的關係，只用漢字無法清楚標記韓國的固有語言，新羅時代使用「吏讀」方式，用漢字的發音和意思表現固有詞彙，但為數不多。朝鮮初期，世宗大王創製（1443）韓文字母（訓民正音，Hangul Joseon mun），為了使新制文字普及，朝廷主動翻譯編撰《龍飛御天歌》、《三綱行實圖》、《東國正韻》、《月印千江之曲》等，後來還出版《杜詩諺解》以及《老乞大》、《朴通事》等漢語課本。但是上層文人學士在寫作時，使用韓文的機會很少，官用語言和士人的學習課本，上奏文和文人之間的簡牘仍然使用漢字。但朝鮮中後期以後，宮廷和士大夫家庭婦女慢慢出現使用韓文來寫信的現象。

由於韓文的推廣使用，在實際需要的情況下，一些中國小說或韓國漢文小說出現了韓文翻譯本，有的先進文人也開始以韓文創作，並出現了文人將韓文創作小說再轉譯成漢文的情況。因此，朝鮮後期的主要作品都有韓漢兩種文字的寫本或版本。

³³ 李相璜〈詰稗〉（1788年），收錄於文集《桐漁遺集》，奎章閣所藏。母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Ⅱ》（首爾：以會出版，2005），頁316-318

例如，金萬重（1637-1692）以韓文創作的《謝氏南征記》，便由他的從孫金春澤（1670-1717）譯成漢文。金春澤在〈翻諺南征記序〉中說：

先生之作以諺，蓋欲望使閭巷婦女，皆得以諷誦觀感，故亦非偶然者，而顧無以列於諸子，愚嘗病焉，會謫居無事，以文字翻出一通，又不自揆，頗增刪而整釐之。然先生特以其性情思致之妙，而有是書，故於諺之中，猶見詞采，今愚所翻，反有不及焉者。³⁴

他在《翻諺南征記序-附凡例》中還說：

諺與文有異，故所翻字句辭語之間，或多不同於原本。

諺故不能盡同者外，或繁複者刪之，或脫漏者添之。又有或改易修潤者。³⁵

朝鮮後期出現的諺解本小說，相當多的是來自中國的明清小說。比較早期（17-18世紀）翻譯的作品有《型世言》、《醒風流》、《平山冷燕》、《禪真逸事》、《聘聘傳（娉娉）》、《西周演義（封神）》、《大明英烈傳》、《列國志》、《三國志演義》等。《型世言》的題名，見於完山李氏序文（1762）中，可推測這部小說可能在明末之前已經流傳到朝鮮，奎章閣所藏原本於1987年才被發現。《聘聘傳》為《剪燈餘話》〈賈雲華還魂記〉的翻譯本，賈雲華名娉娉，諺解本全文為韓文，後來裝訂成冊，封面題名時，不知原委，題名為「聘聘傳」。這樣的現象，在韓文本翻譯小說中經常出現。早期才子佳人小說的代表作《平山冷燕》、《好逑傳》等，很早就在朝鮮宮廷和上層階層流傳。

進入十九世紀，由宮廷搜羅的許多民間流傳的諺解作品，以及宮廷譯官受命翻譯的作品，在由宮女們抄寫成冊後，收藏於昌德宮樂善齋。這些書籍是提供給宮廷妃嬪等女性讀者閱讀、或者讓宮女朗讀給妃嬪聽的，這就是所謂的樂善齋本小說，包括朝鮮創作小說和中國小說的翻譯本。樂善齋本小說全部是抄寫本，具備宮廷獨特的筆體（即宮

³⁴ 金春澤《北軒集》卷16〈散稿〉中「南征記」條。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185，同註4，頁228。而南基泓所藏本《南征記》卷首收錄〈翻諺南征記序〉。母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Ⅱ》，同註33，頁123-124。

³⁵ 金春澤《北軒集》卷16〈散稿〉中「南征記」條。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185，同註4，頁228。金春澤〈翻諺南征記序附凡例〉，母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Ⅱ》，同註33，頁87。

體）。最重要的翻譯本是《紅樓夢》及其續書五種（《後紅樓夢》、《續紅樓夢》、《補紅樓夢》、《紅樓復夢》、《紅樓夢補》），原來共有 262 冊，其中《紅樓夢》120 冊（現存 117 冊），收錄原文及注音，是一部龐大的漢韓對照翻譯本。除了宮廷收藏的諺語解釋本小說之外，民間翻譯的小說也不少，典型的例子是《第一奇諺：鏡花新翻》，即李汝珍《鏡花緣》的朝鮮諺解本，是譯官出身的文人洪義福（1794-1859）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乙未 1835-戊申 1848）斷斷續續翻譯的，全 20 冊現存 18 冊，缺 2 冊，最後翻譯到第 78 回。³⁶這是民間進行翻譯的一個例子。他們翻譯的目的，還是爲了士大夫家庭婦女和一般老百姓閱讀欣賞。

由於時代的變化，加上北學派等文人階層的影響，³⁷朝鮮社會的民族意識全面提高，對固有文化、固有文字更加重視，因此說唱體文學（Pansori）也在各地逐漸發展起來，韓文文學在社會各方面更加普及。十九世紀中期之前，是近代民族國家的準備期。由於翻譯文學的發展，帶動了韓文文學（包括歌詞和小說），使其創作更加活躍，與傳統的漢文學形成雙峰對峙的局面。漢文學和韓文文學之間，也以翻譯的方式頻繁交流，相互之間總有一些影響。因此不僅朝鮮後期的韓文文學帶著固有文化的特色，這一時期的漢文學，在內容和體裁上也開始具有朝鮮特色，與中國傳統的漢文學大有不同。

五、結語

朝鮮文人基本上保持正統的文學觀念，至少在表面上是排斥稗官小說的，但在朝鮮前期，文人之間在對小說的看法上，並沒出現很大的矛盾。當時一些文人在接受《太平廣記》和《剪燈新話》之時，大部分持有比較寬容的態度。小說雖爲儒家所忌，但出於學習和消遣的目的，還是爲一些文人所喜愛。中國小說在朝鮮刊行，主要集中於文言小說，時代也在朝鮮中期以前。長篇小說《三國志演義》的金屬活字出版，則是比較特殊的例外。朝鮮一代沒有發展民間商業出版，也未有書店經營。因此小說的出版，主要在朝廷出版機構校書館以及地方官署的推動下進行。推動出版的人也是該官署的主管官員，出版有時或由有權勢的朝廷高官請託進行。小說或詩話等文學典籍的出版都是因個

³⁶ 洪義福的《第一奇諺》翻譯抄本，1984 年由丁奎福發現，後來原稿失落不明，只有複印件，後來由丁奎福、朴在淵校勘出版，《第一奇諺》（首爾：國學資料院，2001 年）。

³⁷ 北學派，指朝鮮後期的柳得恭、朴趾源、朴齊家、洪大容等一些實學家。他們曾直接考察中國燕京的文化昌盛的真相之後，主張朝鮮應該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思想及生產技術等。學派名稱來自朴齊家《北學議》，而此處之北學典故，實來自《孟子·滕文公上》「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人興趣而私下推動的。

朝鮮文人中關心小說、喜歡小說的人，曾多數參加燕行使節，有機會接觸龐大的中國小說世界。雖然在文集中少有明確記載，但他們利用赴燕機會接觸大量的小說作品，並購買書籍帶回，應該是一個站得住的推測。帶入朝鮮的書籍最初在狹窄的範圍內輪流閱覽，後來有人推動出版，廣泛流傳。到了朝鮮後期，明末清初的小品文和稗官小說的文體直接影響到朝廷文人的寫作習慣，正統文人非常擔心浮華輕薄的文風泛濫，當時國王正祖大王同意此見，強烈推動文體反正運動，禁止輸入雜書。不過，此時小說的影響已經漫延於社會各方面、各階層。主要提供給宮廷妃嬪及貴族家庭婦女閱讀的翻譯諺解本也大量出現。十九世紀形成的樂善齋翻譯小說，為數龐大，包含大部分的明清小說，是翻譯文學史上極為重要的抄寫本。

進入十九世紀，隨著近代民族意識的逐漸提高，小說的創作和翻譯活動更加活躍，內容上則慢慢加入個性自由和民族自覺的思想，為迎接近代開化期的到來做了準備。
(2012-11 初稿，2014-2 修訂稿。研紅軒)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丁奎福、朴在淵校：《第一奇諺》，首爾：國學資料院，2001 年。

東國大學校：《韓國文獻說話全集》，全 10 冊，首爾：太學社，1981 年。

完山李氏序，金德成外畫：《中國小說繪模本》，春川：江原大學出版部，1993 年。

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 年。

母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 I》，首爾：太學社，2001 年。

安大會：《尹春年與詩話文話》，首爾：召命出版，2001 年。

崔溶澈編：《鍾離葫蘆》，鮮文大學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2002 年。

———：《金鰲新話的版本》，首爾：國學資料院，2003 年。

———：《剪燈三種》，首爾：召命出版，2005 年。

許筠著，崔康賢譯：《國譯乙丙朝天錄》，首爾：國立中央圖書館，2005 年。

母岳古小說資料研究會編：《韓國古小說關聯資料集 II》，首爾：以會出版，2005 年。

朴憲淳：《企齋記異》，首爾：凡友出版，2008 年。

朴在淵・金瑛校注：《三國志通俗演義》，鮮文大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首爾：學古房，2010 年。

韓國國史編撰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The Annals of the Joseon Dynasty）。

<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jsp>。

Accep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Novels in the Joseon Dynasty

Choe Yong-chul*

Abstract

For ages, the Joseon Dynasty had embraced much of the distinguished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diffusion of Chinese novels also took a natural course through changes in time. Based on a traditional literary view, some conservative scholars tried to ostracize Chinese novels, yet many scholars enjoyed them; thus they read and privately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rough personal publishing propagated the books. The top classes of literary scholars were the principal people who accepted, thoroughly read, and further composed and published Chinese novels during the early Joseon period. The generous attitude shown by Seo Geojeong and Seong Im well represents this when they accepted *Extensive Records Compiled in the Taiping Years* and *Cutting Candle Romance* in the early Joseon period. Reaching prosperity, as translations and creations of Korean novels increased,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middle-class readers, writers and also women of the royal court. Many scholars were lovers of novels and travelled to Beijing as appointed delegates, who later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adop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novels. Around the 1550s, seizing power in culture society, Yun Chunnyon who was director of the state bureau of publications, Gyoseo Guan, was a significant figure in publishing novels such as *Cutting Candle Romance* and *Kumoshinwha*. There is also a possibility that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etal movable type print version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s published by Yun. Around the 1570s, Gi Daeseung aggressively criticized the publication and diffusion of novels from the viewpoint of a Confucian scholar. Within the society of literary scholars, arguments regarding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novels continued. After 200 years, in the 1770s, King Jeongjo criticized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novels among the

*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Cultural Studies In Minority Group, and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Korea University, Korea.

literary scholars and he raised a “Change in Literary Style Movement.” However, the novels had become more influential in society. During this period, literature translation was improved as ethnic consciousness increased, and through the massive quantity of translations of both Chinese novels and novels of Nakseon Jae, the modern novel period began to set in.

Keyword: Chinese novels, Korean version, *Cutting Candle Romance*,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e in Literary Style Movement.

